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三十三辑（总第二三三辑）

公為

文萃

年青新



中国文史出版社

联合起来

兵



02037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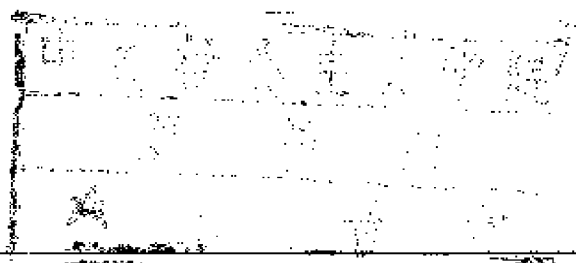
文史资料选辑



201037608

第三十三辑(总第一三三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往事追怀

- 黄埔军校女生队的一段回忆 钟复光(1)
北伐散记 伏笑雨(12)

港澳述往

濠江风云会 赤子报国情

——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

- 陈大白(23)
香港的中文法定运动 黄梦花(43)
航运巨子曹文锦自述 曹文锦(50)

艺海生涯

文艺生涯中的独特经历

——记“青年文化列车” 方掬芬(100)

- 我骑“毛驴”走天涯 克里木(129)

乡村建设

- 晏阳初先生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郑体思(153)

回忆黄巷民众教育试验区 秦柳方(163)

晚清轶闻

晚清重臣李鸿藻事迹述闻 张达骥 李石孙(178)

端王载漪与义和团 毓 运(196)

海外传真

新西兰华侨史(上) 杨汤城(208)

往事追怀

黄埔军校女生队的一段回忆

钟 复 光



作者1903年5月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职，1927年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1945年参加了由李德全女士发起组织的中国妇女联谊会创建活动，任理事，同年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监事。1950年在中央劳动部劳动保险局任处级秘书。1956年后历任中央劳动部干部学院副秘书长、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第五届执委。1992年2月去世。

黄埔军校女生队作为中国第一代女兵，在我国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至今想来，记忆犹新，当年那些并肩作战共过患难的同志、朋友和同学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往事追怀

黄埔军校女生队的一段回忆

钟 复 光



作者1903年5月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职，1927年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1945年参加了由李德全女士发起组织的中国妇女联谊会创建活动，任理事，同年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监事。1950年在中央劳动部劳动保险局任处级秘书。1956年后历任中央劳动部干部学院副秘书长、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第五届执委。1992年2月去世。

黄埔军校女生队作为中国第一代女兵，在我国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至今想来，记忆犹新，当年那些并肩作战共过患难的同志、朋友和同学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中国第一代女兵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由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迁到武汉后组成的，也就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我记得当时招考男生1200人、女生183人，加上原来广州黄埔本校来的1200人，以及1927年3月由南湖学兵团并入黄埔的1300人，因而男队逐渐增加到3700人，其中南湖学兵团还有女生30人，也编入了黄埔女生队，这样女生队扩大为213人。可以这样说，中国女兵最初产生在黄埔，而黄埔的女兵也只有这一期，她们是中国共产党所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代女兵。妇女上正规军事学校，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仅在中国是史无前例，而且在上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我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不满十户人家的小村，童年家境贫寒，从小饱尝了封建势力的压迫。当我在上海《申报》上看到黄埔军校招收女兵的消息，心情无比振奋，一腔热血周身滚淌，恨不得马上前往武汉去报考。那时我正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已怀孕七八个月了，我的老伴施存统（即施复亮）那时又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黄埔军官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这样，我当然就去不成了。多么好的机会就这样眼巴巴地失去了，我心里矛盾重重，曾和施存统赌气地说：“要不是和你结婚，我也去当女兵了。”

1927年1月底2月初，广州党组织的负责人陈延年（陈独秀的大儿子）通知施存统秘密返回上海。施存统奉命回到上海以后，向党中央详细地汇报了他在广州的工作情况。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要他转往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这时，组织上也同意我一同前往，让我担任武汉分校女生队指导员。我真是心潮翻滚，意外欢欣！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兵没有当成，居然一下做了女兵队的指导员。

不久，我同施存统带着孩子来到了武昌。一开始就住在中国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汉军校代理校长邓演达家里，他们夫妇待我们很好，亲如一家，使我们很受感动。邓演达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武汉军校的情况，并把军校内部的左派、右派的底细向我们一一交了底。我诚恳地对他说：“我刚从学校出来，又有小孩，让我担负女生队指导员工作，我不是谦虚，而是恐难胜任。”邓演达温和地对我说：“恽代英在上海大学是你的老师，现任军校政治总教官，仍然是你的老师，有事你可以请教他。”这样，就使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我首先为孩子找了奶妈，又托人在武昌阅马场附近租了几间房子，随后又急电请我的老母来武昌帮助照料家务。

家还没安好，我就去看了恽代英老师，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他以高瞻远瞩的锐利眼光和洞察力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教我怎样开展工作，使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他还教导我说：“过去你当学生，现在当教官，作为指导员，首先要遵纪守法，为人师表，什么事情都要以身作则，走在大家前头。你上大学是党培养的，你到女生队当指导员也是党的安排，一定要尽职尽责。”这些亲切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军校里的生活

安好家以后，我就换上了军装。军校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设在这个大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军校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教官有沈雁冰、许德珩、朱文彬、吴文祺，军事总教官是兰腾蛟，总队长是杨树松，女生队长是郑奠邦，区队长是杨伯珩等，女生队指导员除我外，还有彭漪兰和唐维淑担负政治管理工作。

军校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绝不能像过去当学生时那样散散漫漫。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10分钟内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

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大家马上起立，没吃完的就要受到批评。记得当时为了照顾我有小孩，有人让我打了饭在楼上吃，我觉得自己应该自觉地遵守军纪，不能搞特殊化，尤其是我牢记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对我的教育和期望。于是我一面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一面克服困难坚持在楼下饭堂和大家一块儿用餐，后来也就逐渐习惯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是：上午政治课，下午军事训练课。其中有全校性的大课，一般在男生队的大礼堂和饭堂举行，天气热时就改在操场上课。恽代英讲课的内容主要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有时讲党的领导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讲妇女解放，许德珩讲共产主义ABC，陈独秀、周恩来、邓演达、李达、吴文祺、陈潭秋和郭沫若等领导人也经常给我们作报告。除了上大课外，女生队政治课都在女生队饭堂里上。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女生队和男生队虽然只隔一堵墙，但一般情况下不能互相往来，只有歌声把男女生队无形地联系起来，“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歌声铿锵震耳，互相呼应。现在回忆起来，声音仍在耳边，那种紧张严肃的战斗生活至今仍鼓舞激励着我。

我们当指导员的时刻都和学员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听课，一起进行军事训练。晚上熄灯号吹过以后，任何人不许讲话，我们指导员每天都要按时查房。

3月中旬，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军校政治部安排女生队的指导员和男生队的指导员互相派代表轮流参加对方的会议。对此我双手赞成，当然个别人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女生队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到男生队去。我的态度是只要上级有这个指示，就要坚决执行。因此，男生队只要有领导人作报告和政治讨论会，我是经常去参加的。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开始搞小动

作，同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矛盾越来越大。这时国民党左派看到蒋介石苗头不对，意识到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马上将军校校长制改为委员制。五个委员中恽代英是中共党员，其他都是国民党左派。委员有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顾孟余、徐谦。其中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是常委。由于谭延闿、邓演达都很忙，实际负责人是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还有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陶希圣负责秘书工作，申仲铭负责宣传工作，吴文祺负责组织工作等。

到了4月份，时局一天天紧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进行大屠杀，消息传到武汉军校，师生群情激奋。4月23日军校全体学员在阅马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同学们高喊口号：“打倒新军阀！”“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女生队由游曦、熊天春、黄杰、廖德璋、黄静汶、陈觉吾、曾宪植等在会场担任巡逻。整个大会充满了战斗的气氛。这次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蒋先云，他是黄埔第一期学生。蒋介石打南昌被围困时，他曾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了蒋介石，因而蒋介石给了他上千元的奖金，他却分文不要，将全部奖金交了党费。在这次阅马场反蒋大会上，他慷慨激昂，痛斥蒋介石并把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但是，在第二次北伐中，他不幸牺牲了。

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也蠢蠢欲动。他们采取最卑鄙的手段，在武汉收买了一批妓女，组成裸体队，准备举行“裸体游行”，并向社会上造舆论，把这些妓女说成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员，千方百计地离间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为了不让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得逞，军校组织了一支宣传队，由赵一曼（那时叫李淑宁）率领向人民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并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一时期的斗争生活对女生队的学员们以后所走的道路影响很大，如赵一曼、胡毓秀、陶恒馥、彭援华等就是在斗争中加入了党的组织。

到了5月初，武汉军校胜利地召开反蒋大会，震惊了世界。第三国际派来一个代表团在军校里举行了一次报告会，大会设在男生队两湖书院里的大操场上，我记得美、法、苏等国代表在工人运动的领袖苏兆征的陪同下进入了会场，陈独秀、汪精卫也都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恽代英主持，汪精卫这时还没有暴露出来，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左派。在会场上他高声叫喊：“凡是革命的都到左边来！”苏联代表也给我们打气，使参加大会的人都非常振奋。那天太阳光很强烈，晒得大家口干舌燥。那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由于怀孕的反应，渐渐支持不住了，可是仍然坚持不离开会场，不愿丢掉亲耳聆听这次报告的机会。当美国人白劳德讲话时，我晕过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还是在这次黄埔同学会上，有人告诉我，那次我晕倒时，幸亏女学员游曦赶紧扶着我，施存统也马上从主席台下来，把我抬下去进行急救。那时，我非常刚强，不甘落后。有一次参加野外活动，天下着滂沱大雨，大家都披着斗篷，我不顾身体的虚弱也跟着去，街上的老乡看见我们就喊“女兵”、“女兵”。那时候妇女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一般都是“大门不许出，二门不敢迈”，当街上人们看到穿着灰军装、打上绑腿、戴上军帽的女兵队伍，自然觉得新奇，纷纷议论，非常热闹。我跟在队伍的后面，因为个子高大，有人就说：“你看，最后面那个大高个是个男军官。”我看着雨中行进的队伍威风凛凛，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那时候女生队的学员都能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对待自己。军校为了使男女有所区别，决定让女生队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W”标记，并发短枪。可是大家不同意，并说，既然男女平等，为什么还要有区别呢？军校最后只好取消了这一决定。结果除了留有短头发之外，男女生在外表上看不出区别。可是戴上军帽，就完全分不出男女生了。尽管这样，女生队的学员们还不满足，她们偷偷地将头发剃光了，上课时，脱下军帽，使老师大吃一惊。军校为了照顾女生生理上的特点，如果来了月经，只要带上一个袖章就可以不上操、不参加军训。但是女生坚决不带，凭

着主观热情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以致有的人把身体搞垮了。可是她们一致表示,要和男的一样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男生能干的女生也能做到。我看到女生队的学员们个个都很顽强,听到她们那朴素而真诚的语言,深深地受到感动。我作为指导员决不能落后,只要领导上布置的工作,我都耐心、细致、周到地做好,并常和学员们促膝谈心,使她们感到我平易近人。

那时我很活跃,只要有社会活动,都积极参加。我曾随同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三·八庆祝会。在这之前,我就与该会的负责人李哲时(文宜)、赵君陶取得联系。因为我是女生队的指导员,她们在湖北妇协里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宣传委员的职务。

5月初,在汉口召开了一个党内会议,传达国民党内幕的情况,我也参加了会议。当会议结束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向警予大姐,真是喜出望外。那天我穿着军装,就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她很惊讶,说:“咦!你当女兵了。”她告诉我,她4月份刚从莫斯科回国,让我有事到她工作的地点去找她。我真想和她多谈谈,但她有别的事不能多谈就分手了。过去,我在向警予大姐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是向警予大姐与邓中夏老师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向警予大姐是妇女运动的先驱,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自从这以后,我与向警予大姐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她当年对我的启发、教导以及她那可亲可敬的身影、爽朗的笑声,将永远深深地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在战斗中成长

四·一二事变以后,无数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正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时,蒋介石唆使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围攻武汉,并很快地到了离武昌只有三

四十里的纸坊。形势非常紧急，中央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将军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成中央独立师，女生队为政治连，又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并受叶挺将军指挥。独立师由军校教育长侯连瀛任师长，杨树松任副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出征前，独立师在武昌南湖飞机场誓师，西征讨逆。毛泽东、陈独秀、吴玉章、宋庆龄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大会，还做了重要指示。我们女生队除了少数有病的和小脚的学员留在后方外，其余全都上了前线。我当时虽然怀孕，行动不便，但是我想学员们都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了，而我作为指导员怎能不上战场呢？于是，我就暗暗下定决心，并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出发前，湖北妇女协会赵君陶等人还亲自到火车站送行，并赠给了女生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革命先锋”。我们带上这面锦旗在叶挺将军、恽代英党代表统帅下奔赴了战场。

我们是坐闷罐车出发的，外面是漆黑的夜，什么都看不清楚。当我们到了纸坊，天刚麻麻亮，那里的敌人已被我们的部队打垮了，还有些隐约的枪炮声从远处传来。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男同学的尸体用芦席盖着，大家无不感到悲愤。

第二天我们到了土地堂。用饭时，只有很少的咸菜，大家让着吃，个别人有些怨言。饭后，施存统来到女生队，严肃地指出，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以后生活会更艰苦，越艰苦我们越要尊重后勤人员，不要看不起他们，后勤人员也是为了革命，没有他们我们怎么打仗呢？我们的胜利是和他们的工作分不开的。大家听后觉得有道理，心里都亮堂了，这对女生队西征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战火的推进，部队由土地堂到了咸宁。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员紧跟作战的男学员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抢救伤员的工作。她们个个勇敢，不顾子弹在头上尖叫，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热情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体现了同志之间

的真挚感情。

咸宁是叛军夏斗寅洗劫过的地方，我们初到这里时，有人看到武装的军队又来了，吓得四处逃散。我们就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还制作宣传品，编写壁报，演出节目等。经过这样反复宣传，我们终于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妇女们都主动给我们送茶、送水，和我们谈知心话。

有的老百姓还主动到我们这里告发当地何家村一个土豪人称何阎王的罪恶。经组织上研究，决定由赵一曼带领胡兰畦、贾孟璠等战士前去捉拿。当她们来到土豪家时，土豪已经逃走了。经过搜查，发现了几坛腌肉，赵一曼就将所有的腌肉分给了老百姓，还让大家提供线索，注意土豪的去向。当赵一曼领着战士回到驻地时，看见院子里围着好多人，有一反绑着手的人被捆在大院的屋檐下，游曦拿着枪站在旁边。这正是赵一曼她们要抓的那个土豪，大家又惊又喜，问游曦是怎么抓到他的。游曦告诉大家说：“土豪从后门逃走时，被当地妇女协会的童妹碰上了，她叫了几个小姑娘盯住他，然后自己跑来报告。我当时正在队部站岗，马上随着童妹去追土豪。这时，土豪正向田间逃跑，我大喝一声‘站住’！土豪还要往前跑，我就朝天开了一枪，那个土豪顿时吓得缩成了一团，一下子就被我们抓到了。”当天下午，在打谷场召开了斗争土豪大会，党代表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我亦代表女生队讲了话，游曦、赵一曼和女生队的学员们受到了表扬。会后应群众的要求，我们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

当部队到了嘉鱼附近时，我们女生队接到施存统交给的一项任务，主要是到矿山找工友来帮助运输枪、炮、子弹等。出发那天正是端午节，天刚亮就动身了，路上饿了就吃点剩饭，渴了就站在河边用手捧点水喝，一直走到了傍晚才到了矿工聚居的地方。汗水把每个同志的衣服都浸透了，腿疼得抬不起来，可是大家没

有一个叫苦的。当我们向工友负责人讲明了情况，马上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而且迅速地组成了一个班子和我们出发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工人阶级是伟大的，是最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

再往前走，困难越来越大，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中了暑，还有些女生由于生病逐渐跟不上队伍了。更糟糕的是，妇女月经来了，连卫生纸也买不到，没办法，任凭经血顺着两条大腿往下流，流多了就用毛巾擦一擦，结果经血和裤子搞在一起，干了以后硬邦邦的。有的竟把两条腿都擦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仍咬紧牙关，一拐一拐地坚持往前走。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如实地向政治部主任施存统作了报告，他指示我带着重病号先返回去。当时我尽管怀孕三个多月，但是往前进的勇气还是很大的。我就和施存统说：“我不回去，我还能跟着队伍往前走。”这时在他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不到一点私情，他抿紧嘴唇盯着我说：“必须服从命令。”我意识到“军令如山”，只能服从，但心里却很不乐意，就马上写了个字条，意思是说：我们正在反封建，不要看不起女同志……交给了施存统。这样，我就带着七八个病号先回到了武昌，其中有赵一曼。

恽代英和施存统带领队伍继续追赶敌人。大约到了6月底，终于把敌人打败了。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人数伤亡是惨重的。后来，我问施存统对我写的条子有什么想法，他一笑对我说：“我当时那么忙，哪有时间看你的条子。”于是从兜里掏出了那个纸条，交还给我。可见，在战争的年月里，时间是非常紧张的。

这次西征，从出征到返校共计34天。在这34天里，女生队学员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

当时，女学员谢冰莹满怀激情地把女生不畏战火硝烟、驰骋疆场的一幅幅真实的画面记录在自己的《女兵日记》里，并随时寄回武汉在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对社会影响很大。

西征胜利归来不久，全校又去南湖演习，师生们全副武装，除

带军毯、雨衣外，连军袋子也装满了米。演习是非常艰苦的，和真的打仗一样，露宿风餐，东奔西跑。演习结束回到了学校，才知道是何键要来缴我们的枪，军校才做出决策把队伍拉了出去。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汪精卫叛变后的武汉乌云滚滚、阴风阵阵，国民党反动派杀气腾腾地从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民党内部清除共产党，我们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校决定提前结业。军校通知，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同学可以自由离校，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职业，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党员则由组织决定，凡有家可归，能找到社会关系或回原校读书的，一律不许跟部队走，听从党组织安排，进行地下工作。在党和人民最艰难的时刻，学员们于7月20日毕业了。于是，我告别了学员们，在党的领导下又奔赴了新的战斗岗位。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在我的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不平常的一段。军校里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的一个侧面，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钟复光口述 张金喜笔记

1985年11月

北伐散记

伏笑雨

本文记载了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举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和中路北伐军具有决定性胜利的漯河大战情况，反映了军阀混战后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的现实，以及马日事变后反革命政权滥捕滥杀共产党人的残酷暴行，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者 1926 年 12 月至 1927 年 2 月在汉口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1927 年 3 月至 8 月在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军二师六团任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中尉干事。

汉口受训

1926 年 7 月 11 日北伐军攻克长沙，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北门吊桥入城，向北正街、红墙街两路分进。万人空巷，鞭炮齐鸣，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人民群众隆重地欢迎雄纠纠气昂昂的北伐亲人。看到如此英勇雄壮的队伍，使我生出羡慕敬仰之情。我也渴望能够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久，机会来了：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在湘、鄂、赣招考政治工作人员，我被录取，于 11 月赴汉口受训。

训练班共有 180 余人，组成一个区队，共两个分队。区队长